

水浒文化与黄淮海社会

SHUIHU WENHUA YU HUANGHUAHAI SHEHUI

潘守皎 著

海外借

 人民出版社

水浒文化与黄淮海社会

SHUIHU WENHUA YU HUANGHUAHAI SHEHUI

潘守皎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张明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文化与黄淮海社会 / 潘守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01-016845-6

I. ①水… II. ①潘… III. ①《水浒》研究②黄淮海平原-人文地理学-研究

IV. ①I207.412②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6583 号

水浒文化与黄淮海社会

SHUIHU WENHUA YU HUANGHUAHAI SHEHUI

潘守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6845-6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山东省“十二五”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基地之水浒文化研究基地成果

序

潘守皎教授虽然较我年轻许多,但因为都对《水浒传》感兴趣的缘故,遂成为相识已久的好友。他是梁山人,又在鲁西南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整整三十年,所以对这一地域的文学与文化极为热爱,其研究也具有许多深入独到之处。他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出版了《王禹偁评传》《晁补之传》《菏泽文化通史》等著作,且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现在守皎教授又完成了这部专著《水浒文化与黄淮海社会》,并嘱我作序,感佩之余,理当从命。

首先,我感到守皎教授的这部大作选取的研究角度十分新颖,将《水浒传》置于区域文化与历史文化的视野之下,便会发现许多新问题,提出许多新见解。根据史书、野史、笔记等文献记载,宋江等三十六人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而《水浒传》的作者却把水泊梁山作为了主要故事发生地,其间原因值得深思。守皎教授经过认真研究,大胆地提出了当年宋江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水泊梁山一带,本书前九章便对此观点进行了系统论述。

《水浒传》中宋江起义的根据地梁山泊,原本是由上古的大野泽演变而来。大野泽又名巨野泽,是远古鲁西南地区的四大名泽之一。由于黄河的多次泛滥,大野泽的西南部因受河水泥沙淤积抬高,湖区向相对低洼的东北方向移动。五代后晋时期梁山泊形成。宋时称为梁山泊,是因为梁山已成为湖中的孤山,巨野泽也就逐渐被梁山泺、梁山泊的名称所取代。

秦末以来,由于社会的动乱,黄淮海鲁西南民风开始了渐变。原来的先王遗风、君子之风,好稼穡、恶衣食、重畜藏的淳朴之风,正逐渐开始充斥武力和盗行。也就是从此际开始,鲁西南的民风之中,便开始形成了看似有些矛盾的两元文化基因,这就是:尚武与好学、豪杰品格与君子理想。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再加上天灾人祸频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造就了一批叱

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其中的山东诸将大多为鲁西南人,如曹州济阴(今东明县)人单雄信,曹州济阳(今东明县)人王伯当,尤其是曹州离狐(今菏泽市牡丹区)人李勣、济州东阿(今山东东平西南)人程咬金等等。唐朝末年,民众反抗风起云涌。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先后起义。

鲁西南地区的剽悍民风,在北宋中期以后达到最严重的地步,以至于这里成为北宋统治者重点防范的“盗区”。早在宋江起义之前,黄麻胡等人就已经开始了以梁山泊为依托的农渔民起义。就像《水浒传》中晁盖、宋江等人来到梁山泊之前就已经有王伦占据山头一样。应当说,宋江等三十六人正是看中了八百里水泊这块便于游击作战的风水宝地,才将其根据地放在了水泊梁山。

守皎教授进而分析了有关文献记载中的模糊或矛盾之处,如既然宋江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京东,那么“犯河北”、“起河朔”等如何解释?所谓京东路,据《宋史·地理志》载,应包括今豫东,山东全省并安徽、江苏北部等地;所谓河朔,应包括京东路巨野泽、梁山泊一带。《宋史·侯蒙传》说宋江“横行齐魏”,而《东都事略·侯蒙传》说“横行河朔”,可见在元人修《宋史》时认为“河朔”即“齐魏”。宋江“起河朔”,乃指夹黄河以北,包括郛城、梁山泊一带。这里地处夹黄河与黄河之间,有八百里梁山泊的河、淖、泽、渚的苇蒲葭蓼做掩护,是宋王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宋江等在这里起事,也符合南宋以来野史和传说关于郛城县的记载。通过细致分析考证,基本上厘清了这些谜团。

其次,守皎教授的这部大作具有文化的厚重感,对《水浒传》中的儒、墨、兵、道、佛诸家思想均做出了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以儒家学说为主,道家、墨家、佛教等学说为辅,儒墨道释的互补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社会思想结构的基本格局,《水浒传》则可以说融会百家,贯穿三教。

守皎教授指出,西周到春秋时期,位于今黄淮海地区的鲁、卫、曹是兄弟之国,宋、齐则是相邻的大国,这几个国家比邻而居,是儒家文化的形成与重要传播区域。尤其是鲁西南地区的鲁、卫、曹国,它们都是姬姓兄弟之国,因此深受作为姬姓宗主国的鲁国文化的影响,春秋时期尤其如此。鲁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周代礼制文化以及后来产生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后期的鲁国,卫和曹则是儒家文化产生之后最重要的传播区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停留时间最多的便是卫国。孔子也曾经几次途径曹国,然而,此时正是曹国走向式微的时期,宵小当道,政局不稳。所以,一向主张“乱邦不居”的孔子,虽然过境曹国,却没有选择在此驻足。卫国的卫灵公虽然算不上一个开明的君主,但卫

却有蘧伯玉这样的贤者,因此,孔子有两次在卫国较长时间的盘桓和逗留。由于地近鲁国,所以,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来自曹、卫,甚至一些被当做鲁人的弟子,其里籍也可能属于曹、卫。因此,如果说儒学诞生于鲁,则曹、卫便是儒学最早的传播之地。孔门之中的很多佼佼者,籍贯都属于鲁、卫、曹,如学业和政绩都十分优异的冉雍、冉求和子贡,德行高尚的冉耕,还有为儒学传承做出极大贡献的子夏等。孔子的另两位弟子宓子贱和巫马施,先后在单父(今菏泽单县)为宰,以儒学精神勤政为民,留下了“鸣琴而治”与“披星戴月”治县的千古佳话。可以看出,由于黄淮海鲁西南地区是儒家思想的原发地,又是其最早辐射的区域,自儒学诞生以来,它就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在复兴儒学的北宋初期,倡导重视经学、文风革新的几位重要人物柳开、石介、王禹偁,都是山南泽北的人物。即便是在水浒故事发生的宋末,儒家文化对世俗社会的深刻影响,依然在这一地区存在。

《水浒传》尤其可贵的是体现了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使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在了被统治者手中。“忠义”是儒家推崇的重要伦理道德准则,但那主要是为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水浒传》对忠义的赞美却建立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之上,正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所说:“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水浒传》的忠义观念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怀疑和责难。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在“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的腐败社会条件下,百姓向往、呼唤“忠义”之士,哪怕是草泽英雄,也远胜于朝廷奸佞。既然朝政把持在奸佞手中,人们自然会将目光转向草泽中的英雄。然而忠义之士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却往往受到排挤、打击、陷害,《水浒传》以冷静严峻客观的笔触揭示了忠义者的悲剧,使人们不期而然地对所谓“忠义”的效果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其对忠义的思考足以发人深省。当今社会不仅仍然需要“忠义”,而且要大力提倡“忠义”,只不过应当给忠义充实进新的内涵。大处来说要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小处来说,应忠于职守、忠于家庭。为人处事要讲求信义,危难之际要见义勇为。这些道德准则可以说是“忠义”观念在当今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水浒传》与墨家文化的渊源关系,也早已被人们普遍论及。因为对于水浒这一干人,墨家文化的流风遗韵更是皮里筋骨都是。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水浒好汉行侠仗义的观念与墨家义以为上的行事原则之间、墨家的巨子制度与水

浒好汉“大哥”的绝对权威之间、墨家思想传播对黄淮海地区慕侠之风的形成之间存在很深的渊源关系。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两者的根本不同还是存在的。墨家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他们期盼牺牲自己,换来社会的正义与公义。为此,他们不惜过着清苦的生活,甚至于以禁欲磨砺自己。相比之下,梁山好汉追求的是一种更为世俗化的人生。

《水浒传》虽然不是一部主要描写战争的书,但它依然揭示了在主要以冷兵器作战的宋代战争的一些特点,这其中有两个方面与孙臆以及《孙臆兵法》渊源颇深。这两个方面就是对于战阵的描写和诡诈道术的运用。《水浒传》中的宋江虽然刀笔精通,但只是说明他具备能文能武的个体本领,于军事战阵原本并不精通,《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写宋江在落难中得神仙所授三卷天书,为以后领兵打仗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

水浒故事从发生到传播的年代,正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水浒传》的作者受这些既定的带有道教色彩浸润的故事传说的影响,再加上同时代浓厚的道教意识的影响,其所著《水浒传》不可避免地 with 道教存在种种纠结。《水浒传》所叙故事,从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到第一百回“宋公名神聚蓼儿洼 徽宗梦游梁山泊”,自始至终都弥漫着神秘的道教色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本是道教中的神仙,九天玄女也是道教中的神仙。《水浒传》与道教的关系还体现在水浒英雄对社会理想的追求方面。梁山英雄追求公正、平等,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本义就是追求公正、平等。从书中看,它有着浓厚的道家色彩。

《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也体现出非常浓厚的果报思想,说明佛教的这一基本理论在其世俗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人心。第三回中当鲁智深打死了郑屠辗转来到代州雁门县,恰好碰上了他此前救出的金翠莲父女。并且得到了金翠莲的新夫赵员外的搭救,从此皈依佛门,改变了一生命运。这就是现实中的所谓的“因果报应”。此外还有,第九回当林冲被刺配沧州之后,一日下午闲逛,在营前遇到了他在东京时经常照料的酒生儿李小二。得到李小二夫妻的照看,林冲的衣服有人浆洗,平时的生活也经常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李小二的通风报信,使林冲获知了陆虞侯等前来暗害他的消息。这为林冲日后逃过这一劫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智深和林冲都是因为先前做了好事,种下了善因,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善报。这也是佛教中所说的“现世报”。从小说中表现的这种“善有善报”的“因

果报应”思想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宋元以来佛教的世俗化,这种思想在民间的接受度非常之高。

最后,我非常赞同守皎教授所提出的“水浒文化”概念。《水浒传》在其刊行传播的数百年间,既赢得了“四大奇书”的美誉,也遭到了屡次的禁毁:视之为“忠义”之作者有之,贬之为“诲盗”之作者亦有之;目之为英雄赞歌者有之,斥之为宣扬投降者亦有之。但无论如何,这部奇书不仅流传了下来,而且涌现了大量的续书、唱本、戏曲、图像,乃至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等等。水浒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梁山好汉可谓深入人心。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且广,丝毫不亚于处于正统文化地位的某种思想学说。从民众心理、道德意识、政治理想、文学艺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范畴,到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交往礼仪等规范层面的文化范畴,再到饮食服饰、娱乐竞技等物质层面的文化范畴,《水浒传》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可以略做补充的是,《水浒传》的规范文化也极有价值,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下层民众只能忍受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却有着自己的社会组织,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一百单八将几乎成为中国民间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不仅仅是将众好汉排列出先后顺序,而是有着具体详细的职责分工。这一组织有着严密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其最受百姓拥戴的是只杀贪官,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这真是令千百万人所叹服的行动纲领。打下祝家庄后,“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祝家庄的百姓“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破了高唐州后,宋江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自华州返回梁山泊,“所过州县,秋毫无犯”。杀入东平府后,宋江“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又“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给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攻下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梁山义军纪律严明,法度谨饬,成为一支仁义之师,也成为后世起义者效仿的榜样。

《水浒传》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体现着优秀的文化传统。鲁智深对林冲

的关爱是那样真诚无私,宋江冒着血海也似的干系为晁盖通风报信,石秀忠心耿耿帮助杨雄。还有武松对兄长的一片深情,李逵对老母的一片孝心。这些都足以使人们受到感动。对那些心地狭窄、嫉贤妒能之辈,忘恩负义、为虎作伥之流,小说则无情地给予了鞭笞,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些规范层面的文化传统理应得到继承和发扬。

若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水浒传》中的饮酒最让人神往。小说所写酒类就有荤酒、素酒、透瓶香酒、茅柴白酒、浑清白酒、村酒、老酒、头脑酒等近十种。小说所写酒具最常见的是碗、瓶、角、旋,有时还用杯、盏、盅、壶、葫芦等。这些略显简陋的酒具正好可以烘托出梁山好汉的豪勇粗爽。小说描写了许多动人的饮酒场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人便吃了一桶酒。林冲见草料场房屋已被雪压塌,便“把花枪挑了酒葫芦来到山神庙中,把葫芦冷酒提来便吃”。“智取生辰纲”在白胜的两桶酒上做足了文章。武松景阳冈前连饮十八碗酒,带着酒意打死了猛虎。尤其是“武松醉打蒋门神”,“无三不过望”,武松一路上见一个酒店吃三碗,一连“吃过十来处好酒肆”,“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过十来碗酒”,然后大闹快活林,将蒋门神打得屁滚尿流。另外,小说中所描写的蹴鞠、博弈、相扑等竞技游艺活动也无不细致生动、脍炙人口。

总之,一部《水浒传》构成了内涵丰富、层次多样的文化体系,继承发扬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可以更有成效地促进当今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这部小说名著的文化价值就能够不断得到开发利用,其生命力也将永远不会衰竭。守皎教授的这部大作本身就是对“水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拓,我愿意与守皎教授一起为弘扬“水浒文化”而继续努力。

是为序。

王 平

2016年初秋于山东大学

目 录

Contents

概 说	1
一、水浒文化界说	2
二、水浒文化的基本内涵	3
三、水浒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20
四、水浒文化的特点	28
五、水浒文化与黄淮海社会	33
第一章 从巨野泽到梁山泊	37
一、鲁西南梁山泊的形成与演变	37
二、唐宋文人笔下的梁山泊风貌	41
第二章 历代“强盗”们的乐园	45
一、山南泽北的第一位大盗——柳下跖	45
二、大野泽里走出的游击专家——彭越	50
三、凄风骤雨狼虎谷——黄巢最后的悲壮	52
四、宋江起义的前奏曲——黄麻胡泺中造反	53
第三章 宋江起义与梁山泊	55
一、宋江起义及其历史谜团	55
二、文献记载中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	57

三、盗据京东与劫掠淮南 60

四、“横行齐魏”与“转略十郡” 66

第四章 走出梁山泊的悲剧 68

一、宋江出击的三次失败 68

二、招降还是请降 70

三、宋江有没有去征方腊 72

四、宋江最后去了哪里 76

五、水浒故事余绪 78

第五章 远古黄淮海地区的淳厚民风 83

一、远古时期淳厚民风的形成 84

二、远古淳厚民风的续篇 90

第六章 秦汉以来民风的渐变 95

一、尚武传统的开启 95

二、事功的诱惑 97

三、耕读家风 99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民风的二元特征 103

一、崇文与尚武的平衡 103

二、游于江左尚文行 107

第八章 隋唐时期黄淮海地区豪杰之风的兴起 112

一、隋唐豪杰之风兴起的原因 112

二、隋末鲁西南地区的各路豪杰 114

三、撼动唐王朝的豪杰——黄巢 121

第九章 五代至北宋时期蔓延的“盗风” 123

一、一段石碑记载的历史 124

二、天灾频仍生计艰难 127

三、人祸相加逼人造反 128

四、“重法”只是双刃剑 130

第十章 黄淮海地区儒家思想承传与《水浒传》 134

一、儒家思想在鲁西南地区的传播与实践 135

二、宋江形象与儒家精神人格的传承 144

三、左、羊忠义故事与《水浒传》 147

第十一章 《水浒传》与黄淮海地区墨家文化遗韵 154

一、墨家文化与侠的渊源 155

二、墨家组织与梁山社会 157

第十二章 黄淮海兵家文化的传承与《水浒传》 160

一、人格被扭曲的军事天才吴起 160

二、吴起与宋江:为人与做事的伦理差异 167

三、《孙子兵法》的续写者孙臆 169

四、《水浒传》与孙臆兵家思想 173

第十三章 黄淮海道佛文化传播与《水浒传》 176

一、《水浒传》与黄淮海地区道教传播 176

二、《水浒传》与黄淮海地区佛教传播 179

第十四章 水浒文化的时空记忆 186

一、鲁西南地区的重要水浒文化遗存 186

二、五种非物质水浒文化遗产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03

后 记 206

概 说

水浒故事在鲁西南为中心的黄淮海地区一直是人们口耳相传的一段英雄传奇,《水浒传》更是一部描述这段传奇的经典小说。宋朝以来,循着民间的系列水浒故事(以说唱文学为主)以及后来的经典小说《水浒传》,一直存在两个关于水浒好汉故事的传播系统。前者是一个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不断衍生各种叙述形式以及生发各种叙述内容的系统,它以水浒好汉和原生的水浒故事为母体,借以表现不同时期市民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而后者虽然属于经典,是一个基本定型化的故事,但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也借助对它的评点、批评和改编等形式来表达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和伦理观念。从而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观念的人对于水浒故事和水浒人物种种不同的肯定与否定、褒扬与贬抑。而且,各种关于《水浒传》的研究和评点,自《水浒传》诞生的数百年以来,从来不曾间断。明清时期有李贽和金圣叹,清末民初则有定一和燕南尚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郑振铎也对《水浒传》进行过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这些评点和研究,推动了水浒研究的与时俱进和不断深入。

在上面的这两个水浒故事系统中,前者无疑对后者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水浒传》就是以前者作为蓝本或者素材创作的。但是,《水浒传》的产生,并不能代替水浒故事民间流传系统的独立性,在水浒故事的原发地尤其如此。所以,两个关于水浒故事的叙事系统虽然有时交叉,却仍然各自存在,并且依然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当然,成书之后的《水浒传》,由于具有典范的叙事手段,也具有思想伦理的深度与高度,因此,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以及它的影响范围又都远超过了前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新媒体的作用,水浒故事的传播开始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水浒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局面。八十年代初,山东电视台拍摄了一系列以水浒人物为主角的电视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开始了关于水浒故事的各种形式的改编。这种改编,实际上很难说只是依据小说《水浒传》而进行的,它已经很自然地吸收了水浒传传说故事系统中的某些情节,并进一步彰显了当代人的某些审美理想和趣味。

在水浒影视剧风靡的同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水浒故事的文化透视也成为人们非常热衷的话题。很多水浒研究者开始由早先比较单一的研究,转向对于《水浒传》的整体文化审视。开始关注小说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宗教色彩、民情风俗等,从而为全方位研究水浒文化拉开了序幕。今天,人们依然关注水浒故事,关注《水浒传》,对于水浒的研究,也已经不局限于小说《水浒传》。甚至于人们更关注以前被作为《水浒传》创作蓝本或者素材的水浒本事的文献记载、民间说唱和故事传说,还有元明水浒戏等。此外,《水浒传》的作者,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水浒故事发生地的风土人情也都被人们关注和研究。这些研究,被总称之为水浒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这种综合性的水浒研究更具有价值和意义。

一、水浒文化界说

作为一个具有区域文化以及文化社会学意义的概念,水浒文化这一称谓已然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且也经常被人们使用。只是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模糊化,大约只要与水浒故事、水浒地域、水浒人物以及《水浒传》等相关联,便一律谓之水浒文化。当然,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方式,能够呈现水浒文化丰富多元的特征,但长此以往,也可能会使得水浒文化研究失去方向,走入迷茫。因此,对于其内涵与外延作一些规定也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一直以来,也确实有很多人试图做这一工作。那么,该究竟怎么界定水浒文化呢?

关于水浒文化概念的界定,长期从事水浒文化研究的王振星先生曾经这样认为:“从狭义上说,水浒文化是以《水浒传》为核心,在水浒故事产生、成书和传播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与其相关的一切政治、伦理、宗教、军事、艺术、价值、习俗等精神现象的总和。从广义上看,水浒文化遗迹以及由水浒故事产生的各种物化形态,也属于水浒文化。”^①应该说,王振星先生给予水浒文化的这一定义是

^① 王振星:《对水浒文化界定的再思考》,《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页。

比较全面的,它体现了王先生多年来对水浒文化研究的认知,但王先生的定义也有些过于扩大了水浒文化的内容范围并高估了其价值意义,使得这一概念的具象意义不太明显。杨彩云女士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对水浒文化意笃情深的地方文化史研究学者。她这样概述水浒文化的定义:“水浒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鲁西一带几千年形成并代代传承发展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在《水浒传》之前虽然没有专门的称谓,但作为土著文化却在民风民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的核心便是‘勇武’和‘侠义’”。^① 杨女士对于水浒文化的阐释更多突出的是这一概念的地方文化风俗意义,其具体所指简单明了,但并没有广泛地揭示水浒文化的基本内涵。

水浒文化虽然可以被看作地域文化,但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地域,而成为一种混合着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地方风俗文化以及江湖文化的复杂文化现象。所以,我们认为,不能只简单地把水浒文化仅仅看作是地域文化概念,而应该寻求另一种更为客观的描述。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水浒文化应是一个类文化丛概念。文化丛是在一定时间、空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丛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文化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人、事件并围绕着这一时间和空间的人和事件而生发的人的精神品格以及故事的价值内涵。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连接和整合作用的文化现象或文化遗存以及系列产品。

二、水浒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水浒文化这一概念中,特定的时间是指水浒文化形成的时间,即水浒故事发生至《水浒传》小说问世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空间则是指以古代梁山泊为中心的黄淮流域以鲁西南为中心的地区。即今天山东西部、西南部、南部以及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区域。特定的人的精神品格是指以水浒好汉为代表的群体人格,特定的故事价值内涵则是指水浒故事传说以及小说《水浒传》所体现的基本文化观念和思想诉求。上述意涵的物质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衍生品也属于水浒文化范畴。

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是水浒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水浒文化特质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赋予水浒文化区别于其他类似文化的一些

^① 杨彩云:《水浒文化之我见》,《水浒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济南,2014年8月。

质的规定性,使得它既承载传统又特色鲜明。而特定的人的精神品格、特定的故事价值内涵则是水浒文化的基本特质所在,它规定了水浒文化的内容和价值意义。

任何事物都有萌芽、成型和发展的时期,水浒文化的形成也有这三个时期。这里之所以把水浒文化这一概念中所规定的特定时间界定为水浒故事发生至《水浒传》小说问世这一历史时期,旨在凸显这一时期在水浒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不与后面所划分的水浒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三段论有矛盾。因为这一时期是水浒故事发生和传播的重要阶段,水浒好汉的群体人格以及小说《水浒传》的价值内涵都在这一时期奠定,而这两个方面则是水浒文化的基本内涵。

以水浒好汉为代表的群体人格,人们已经有过多种概括。如长期从事地方文化与水浒研究的杨彩云女士,看到了水浒好汉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化传统,认为水浒好汉的人格中有鲁西南人传统的人格特征,这种突出的人格便是“勇武”和“侠义”：“勇武和侠义也是《水浒传》英雄共有的特征,正是赖于这种特征,才使梁山好汉们有了炫目的光彩和魅力。”^①从对地方文化的珍视以及对水浒好汉的喜爱这一立场出发,杨彩云女士更喜欢民间传说中的宋江等人物形象,不太愿意接受《水浒传》小说中宋江等人的悲惨结局,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中的宋江形象更有微词:“这一地域的人文精神中有一块反骨,英雄豪杰如果没有了反骨便不成为豪杰,所以宋江的投降在当地人的情感上是非常勉强的,更不愿认可最终的鸩杀。这不仅是个理念问题,还有个情感问题:让本土英雄如此枉死难以接受。”“《水浒传》剧遵循的是原著的某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某些方面与大水浒文化相悖,与人们的价值取向相悖,是人们忽视不计或根本不认可的。更何况表演中夸大了投降成分,缩减了侠义成分,双向反差很大。也许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是民间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古已有之。总之《水浒传》和水浒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窃以为,以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当代文化媒体,还是顺应民意尊重民意为好。”

杨彩云女士的观点代表了不少地方文化研究学者对于水浒好汉人格的评价态度,这种评价表明民间水浒叙事所承载的水浒文化精神更容易得到地方文化研究者的认同。但这种态度的感性意味太过浓重,全面、理性、客观的审视则显得不够。既然水浒文化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并围绕着这一时间和

^① 杨彩云:《水浒文化之我见》,《水浒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济南,2014年8月。